

“遗产”与“界碑”

——《朱自清文集》出版论略

邱雪松

内容提要 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后，清华校方决定出版全集以作纪念，并成立了编委会，上海的开明书店也允诺承印全集。但1949年之后编委会成员对政治风向的谨慎把握，朱自清其人其作评价的起伏，出版社遭遇的经济困境及人事变动等种种因素，导致这项“遗产”直到1953年3月才以删减后的《朱自清文集》面貌问世。对于“文学”与“出版”而言，《朱自清文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出版方式之间的一块“界碑”，此后私营出版社逐步撤离文学出版领域，作者和编辑在出版过程中退居弱势地位，读者批评则作为重要力量介入其中，一整套与“当代文学”相配合的出版体制得以建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不幸病逝。不久，清华大学校方动议与开明书店合作出版全集以作纪念。此时双方合作的《闻一多全集》出版在即，考虑到该书仅用了两年时间，因此各界认为《朱自清全集》的出版也应同样顺利。但遭逢时代鼎革的朱氏全集，出版却一直遥遥无期，直到1953年才以“文集”的删减形式艰难问世。

《朱自清文集》的坎坷命运，是由建国后参编人员、出版社、相关部门领导、朱自清政治形象及作品评价升降、读者反应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它的出版标明了自1917年创始的新文学出版方式被断然地划上了句号，而在1949年后的文学出版体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思维与运作流程则初现端倪。基于如上认识，笔者以日记、书信、旧体诗还原与事之人做各项决定的微妙心态，根据开明书店内部档案爬梳出版社的错综境况，通过彼时相关政论、期刊文章来表现外界环境，立体重现《朱自清文集》的出版经过。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出版”于其中角色的位移及作用。

一

1948年8月26日，朱自清治丧委员会在清华

大学同方部举行的追悼会上决定成立“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下简称“编委会”），编委会成员由吴晗、俞平伯、浦江清、李广田、王瑶、余冠英、徐调孚、季镇淮、陈竹隐、叶圣陶、郑振铎等十一人组成，专司整理文稿和出版全集事宜。27日，俞平伯致信叶圣陶：“其全集闻开明允印，甚佳。编纂者，清华同人将弟名列入，自谊不容辞，但亦不知如何着手也。”^①但有意思的是，早在十天之前，上海的叶圣陶日记里就有：“吴辰伯书来，言关于佩弦身后拟作三项：一、凑一笔款，贍其家属；二、各人作纪念文字；三、为出全集。并问开明有无出全集之意，宜尽先考虑。”^②吴晗信业已逸失，无从详考，但考虑京沪通邮时间及内容，当写于朱自清逝世不久无疑。次日叶圣陶“作书复各处，将近十封。店中决定接受出版佩弦之全集，因告吴辰伯”^③。时任开明书店秘书处主任的王伯祥同日记有：“上午十一时，出席一七一次经理室会议，决定宣收退稿件多起，并决致赙佩弦五亿元。”^④随后开明书店旗下刊物《中学生》（九月号）、《国文月刊》（第71期）和《开明》（新7期）都设立专栏，刊载叶圣陶、郭绍虞、浦江清、朱光潜、李广田等的纪念文章。可见，开明上下对吴晗的诸项提议都予以了积极响应。

俞平伯对老友表示“不知如何着手”，但叶圣

陶一样犯难。这其中缘由颇复杂。从当时的清华学生杨天堂9月1日的日记“晚间和良夫一块去见吴辰伯先生……谈到编朱先生全集的事，他对余浦二先生均表不满。他说叶绍钧、郑振铎、俞平伯都可以参加进来……”^⑤推断，编委会人员众多，缺乏沟通应是主因。叶圣陶迟至9月1日始有“谈佩弦全集事”。6日他才有机会与来沪的吴晗“亦谈佩之全集”^⑥。同日早间叶圣陶写了一封信回复陈竹隐，从出版社的角度第一次详尽地商讨此事：

至于全集，尊见皆极是。全集与单行本自宜并行。版权当然归家属所有。版税支付办法，开明现新定一次支付，即每版印若干部，出版时即一次付清。惟第一版与第二版第三版略有参差，第一版较少，第二版较多，第三版更多，以后至无论几版，均依此更多之数。其数如何，于订立契约时双方商定。俟编辑大体就绪，即当订立契约也。今日接李广田先生来书，谓三日在辰伯先生家讨论編集事，不知有何决定。我意夫人须请北平诸友中推定一位，负责收集及与上海通信，如是则一切集中，进行可以从速。此间之意，亦颇欲继“闻集”之后，将佩兄全集早行问世。佩兄于已出版之各集均自有校订，闻包成一包，此一包须设法带来，以凭参照。^⑦

由17日“得浦江清来书，详谈佩弦全集事”可知，叶氏的信促成了由浦江清负责收集稿件，并与上海方面联系。虽然叶圣陶在信中表明店方愿尽快出版的态度，但除9月19日再与吴晗“议及佩弦全集出版事”^⑧外，本年叶氏日记再无提及出版事。

上海方面的进度迟缓事出有因。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诸多原因导致国统区经济崩溃，开明书店的运营受到影响；“国定本”教科书版权的公开，对教科书占收入一半以上的开明更带来莫大冲击。叶圣陶感叹“我店于书业中为认真办事者，一本往日作风而益求改进，事业宜可发展。无如时势限之，便常感困窘耳”^⑨。另一方面，在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创办人章锡琛视开明为家族企业，力主裁汰人员，而叶圣陶希望上下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双方的分歧日渐加深，最后叶圣陶于7月辞去董事、协理二职，转为普通编辑，并表态“余非消极，实不

愿费无谓之神思耳。雪村想心思每自是，视开明为一人之业，此余所看不惯者。本欲勉于扶掖，俾共守集议共商之路，而渠每出言不逊，余不能说服之，而心则不快，恒起方案。遂退出此局，亦使人知以后凡有决策，余无其份也”^⑩。在编译层群龙失首的前提下，北平方面冀望开明就此事全力配合显然勉为其难。到了年底，杜国庠、吴觉农先后传达中共方面邀约叶圣陶北上之意，他略加考虑后即正式离职开明书店，于翌年1月7日偕妻离沪借道香港奔赴北平。^⑪

其时清华诸人正有条不紊地收集整理文稿。季镇淮9月底从南京来北平后即受托着手编写年谱^⑫，李广田、王瑶、郭良夫、叶兢耕等亦承担部分任务。众人中王瑶行动最为迅速，10月中旬就整理完毕《古逸歌谣集说》^⑬。年底，有感于时局变化，清华方面加快了工作进度。据浦江清12月13日的日记：“下课后见王昭深，我告以朱先生稿件立刻要集中，所抄副本今明两日抢发到上海去。他说他即刻要进城，原稿已交朱太太，副本在他的研究室中。……另由邮局寄发《朱自清全集拟目》油印一份至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邮局照常收件，但朱稿太多，且有未曾校好者，不及寄发，只得留着了。……下午炮声很紧，且闻机枪声。知清河失守，火线离清华园不远。昭深等也不及入城。”^⑭浦王二人手中的稿件由于战火原因，未能寄出，但浦江清所拟的全集目录却侥幸寄出，这无疑为日后编委会继续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⑮。

叶圣陶离开上海时将全集编辑事宜托与徐诒孚。浦江清于1949年2月1日接到前者来信“询问朱佩弦全集编辑事”^⑯。但此时北平与上海方面邮政业已中断，浦江清无从回复，全集讨论事项只能留待叶圣陶来平再议。

二

1949年3月18日叶圣陶到达北平，21日即至清华拜访陈竹隐，并与浦江清商议全集出版。虽然不久他即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等要职，但仍记挂着好友全集的出版工作。据叶圣陶未刊日记^⑰，“（10月26日）下午，浦江清来，与均正会晤，谈佩弦全集付排事。俱云年底可以编齐，分量视闻

一多集为多。赶紧付排,明年上半年或可出版”。见工作进展如此之迅速,叶圣陶遂于11月23日作为保证人与开明书店签订了版税支付事项,按照协议,开明书店负责出版《朱自清全集》,版税率为15%^⑨。次年1月1日他还与来访的俞平伯商定,为即将出版的《朱自清全集》合写一篇序文,由俞先行起草,他做修改润色工作^⑩。

然而开明在建国后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化,却将这一日程大大推后。上海刚解放不久,开明协理朱达君于6月、10月两次赴京,向胡愈之、叶圣陶等了解国家出版业的政策和规划,听取他们对开明书店在新社会的发展建议。在获知相关信息后,开明书店董事会于1950年2月16日正式具文出版总署,陈述愿依照《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之规定请求公私合营,出版总署于4月3日予以回复。鉴于开明的资产良好,总署采取不投入资金,仅委派三名工作人员,与开明书店的三名资方代表、三名职工代表组成业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出版社的“公私合作”的形式。在批文最后,总署要求开明管理处尽早赴京,以便开展工作^⑪。8月25日生产部门陆续迁京。开明书店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递交的报告对搬迁影响做了说明:“由于这一迁移,使工作一时不能积极展开,又因我店本身并无排字印刷工厂,在此过渡时期,编辑工作自然难免受相当牵制,预计须于十月以后始能渐上轨道。”^⑫

如果说迁移带来的困难还能克服的话,人才流失却是无法弥补的。解放后,出版社中有人参加南下工作队,有人到了政府机构,校订部主任顾均正坦陈剩下人员无法应对当前任务:

再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人手的不足,现在生产部共有二十九人,但吕先生是不能每天来工作的,实际上只二十八人,我和调孚先生忙于事务工作,不能做正式的生产工作,那末只有二十六人了,二十六人中属于编校部分的只有二十一人,而有六位还留在上海,负责上海方面的排校及联络工作,所以在北京只有十五人。其中还分出了三位编辑和二

位办事员来担任两个杂志的工作,余下十人中,六位是编辑,二位是校对,二位是办事员,实际上工作的就只有这几个人。生产的计划在逐渐扩大,想从每月一百万字扩大到一百五十万字,到两百万字,而工作人手则还没有增加。^⑬

随着编译所主任吕叔湘离开,总经理范洗人病逝,年轻人开始走向前台,开明书店在他们的带领下逐步按照国家对出版业设定的计划开始了变革。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着重讨论了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的分工问题以及调整出版业公私关系问题。根据上级安排及出版社的历史,开明书店确定了“倾向于应用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⑭的出版方向。这样的调整对开明书店在新的时代下接受领导,避免同业无谓竞争,有一定益处。但年轻的主事者在领导开明书店转型时思想过于僵化,视《朱自清全集》与未来方向不合,一再变更其在书店计划中的排序。在开明1949年底造具的1950至1952年的编辑出版计划中,《朱自清全集》是该计划中唯一的文学类出版物。故1950年3月王伯祥还特意“为佩弦遗集事致书叔湘,促江清速寄稿”^⑮。7月出版社另定的本年8月至12月的工作计划,《朱自清全集》尚为甲类“本店自编新书”的第六位,预计每月可排版15万字。但两个月后就风云突变,建国后文化部艺术局预备编辑几套丛书,开明从中选择了《新文学选集》和《古典文学丛书》^⑯。为了配合此项任务,9月制定的新计划表示“至于店内自己编辑书稿的工作,只能择重点进行”,《朱自清全集》不再专名标注,被以“作家选集”代称,排在“新文学创作及译作”和“新文学选集”之后,位列末位^⑰。

以上原因导致《朱自清全集》不可能于1950年出版。不过整理工作依旧按部就班进行,浦江清在5月告知来访的王伯祥,全集之年谱序文等五月可杀青^⑱,据此推测朱自清的稿件应已全部整理完毕,故开明书店11月向出版总署提交的报告里非常肯定地写到“《朱自清全集》全部二百万字,已有一半排好,一九五一年度准可出版”^⑲。

三

1949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别了，司徒雷登》，里面有如下著名的段落：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⑧

对比朱自清过世之时，《人民日报》仅于9月15日刊登了《华北文艺界协会 唁唁朱自清家属》一则短讯。一年以后，各方的需要使得朱自清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介文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凸显了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意义，树立了朱本人追求进步的“英雄”形象。对《朱自清全集》来讲，其带来的是积极的讯息，出版社明确意识到它在新社会将具有的价值。此时，教科书改为国营，书店收入锐减，遭遇经济困难，需要出版总署在1951年冬拨款相助；甚至先后放弃股东郑振铎、文化部长茅盾、作家巴金的书籍，进而到了1952年打破从不拖欠作家稿费的传统，无法按时支付版税；乃至激进青年上台等，诸多不利情况下，开明依旧为“全集”出版的浩大工程做着准备。

然而，一场意料之外的关于朱自清文章《背影》的讨论却改变了一切。1951年7月《人民教育》发表《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该文认为“朱自清的《背影》在目前说来，的确是一篇很不好教的东西。这课书，在今日青少年学生前面，抽象而颓弱地渲染着一个父子之爱，是与当前三大政治任务——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矛盾的。……再者，纵使《背影》的超阶级的思想感情与目前的政治任务不相矛盾，光就朱自清那三次感情脆弱，有点林黛玉式的下泪，就可能给感情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学生以不健康的感染”^⑨。同月，在上海出版的华东地区教育指导性刊物《新教育》中也刊登了两封来自华东局机关学校教员的批判信，信中认为《背影》：“一，立场错误，作者是小资产阶级，作品只描写单纯家庭间的父子之情，没有现实的教育意义，更没有体现小资产阶级的

改造过程，甚至还嘲笑小贩、茶房等无产阶级人民；二，过分悲伤、煽情，作者数次无故落泪，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三，犯了纯技术观点的错误，作品的形式和思想性是分不开的，《背影》的写法、结构即使再好，但是内容不好，没有思政教育意义，学习它就是犯了纯技术观点的错误。”^⑩

10月份《人民教育》针对《背影》引发的争论集中刊文，虽然也发表了《有了问题要和大家商量》、《我这样教〈背影〉》、《问题在于教者的思想政治水平》等商榷口吻的辩护文章，但《〈背影〉不应该选作教材》、《〈背影〉已经失掉意义了》等否定的声音更占上风，而杂志社编辑所写的《对〈背影〉的意见》一文从官方的立场做了总结：“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语文课本……已经是过时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要求了。”^⑪

虽然这看上去只是一场事关新中国课本篇目选用的论争，但人教社社长恰好是叶圣陶，作为全集编委会委员他开始变得慎重。出版社方面以编辑周振甫为代表，最早明确提及这个问题。据叶圣陶日记10月17日所记：“午后，周振甫来。前年年初一别，今为初晤。渠以佩弦全集之校样数篇来相商，谓以今日观之，佩弦之某些想法可以无须刊布问世。余以为然，谓可存其目而下注‘删’字。”当时叶圣陶对“全集”尚存希望，认为可存目处理，故他12月9日的日记还如是记下：“（吕叔湘）交我以季镇淮所撰佩弦之年谱。佩弦全集一拖再拖，时已三年，尚未出版，思之疚心。总望诸友催促，开明赶紧，能于明年暑前出版。”

1952年4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终为选用《背影》做出书面深刻检讨：

我们完全同意编者的意见，认为这篇课文对于青年“是绝对有害的”。故在此书重版时，便把这课取消了。为了从错误中取得教训，我们还专门开了检讨会。大家认为：这篇课文，不但在今天说来是有害的，就在朱自清先生写作此文的当时（一九二〇年），也是一篇思想落后的文章。……从政治来看，这是一篇为旧政治服务的作品。因此，不但在国民党的教科书中有它的地位，就连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教科书中，也同样有它的地位。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它呢？这说

明我们的阶级观点太模糊了，也说明我们还有单纯强调文字技术的观点。这就是造成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③

随后在5月17日的一次讨论上，编委会通过了不出“全集”改出“文集”的决定：

午后二时，偕彬然至市政府晤吴辰伯，商量佩弦全集之出版问题。参加者尚有平伯、江清、均正、振铎、佩弦夫人五人。佩弦全集在开明排版，已成大半。而以今日看佩弦之作，有若干篇不合时宜，于读者无裨，因有重加考虑之必要。余前数日与辰伯谈及此事，共谓佩弦若在，自定其文，必将有若干篇须从删弃。故我辈为出全集，一必对得起佩弦，不逊其在群众之印象。二必对得起读者，使读者读之有所受益。至于以马列主义为衡，则非所宜，盖以马列主义求之于佩弦，即非历史主义矣。今日辰伯说明此义，讨论许久，决定不出全集而出文集，数人分别重看其文，觉有不适，即从删去，所收者以具有进步性为准。余分得三种。月底诸人看完，再集会商量。

编委会认识到朱自清作品“有若干篇不合时宜，于读者无裨”，删弃在所难免，但编委们不愿削足适履地“以马列主义为衡”，最后妥协成以“进步性”为选文标准，改出“文集”。叶圣陶深悟此中变化：“念出版故人之集子，宜分别言之。如为纪念性质，则宜求其全，一鳞一爪，皆搜罗无遗。如为流通以益人之意义，则宜慎为抉择，虽不能以今日之标准为标准，至少亦须以今日观之尚有进步性，于读者多少有好处。自后一点观之，则颇有可删者矣。”“进步性”标准的提出，表明编委会诸人彻底意识到出版朱自清作品不能再如《闻一多全集》那样系友人出于情谊的带纪念性质的私人行为，它背后有着十足的政治内涵。

7月27日编委会再次聚首，“讨论两小时许，决定定名《朱自清文集》，散文而外，收系统的著作两种，诸人看过主张删去者全删，其余八十至一百万言。序文请王瑶起草，俟大家看过修改，署辰伯、平伯、振铎及余之名。出版期于十月上旬，缘过此以后，开明将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以专业方向言，不宜出此类书矣。佩弦夫人似颇心慰，可于其容色见之”。旁听的王伯祥同样感叹

“出版文集有所决定，久悬之案至此获一解答矣”^④。9月11日，《朱自清文集》以10%的版税重新签订合同。^⑤

不料最后又事起微澜。叶圣陶在8月26日接到王瑶所写序文时，评价甚高：“王瑶为佩弦弟子，深悉其治学与为人，此序大体不错。以振铎、辰伯、平伯及余之名义刊布之，尚为得体。”他当即油印分发众人提意见，孰知大家以“夸饰处多，不合用”否决，商议推叶圣陶做一简单题记，“叙此集拖延至四年以上，几经变更之经过”。不知情的浦江清大为不解，主张仍用王瑶之作，叶圣陶不得已于1953年1月23日致信浦江清，以实情告知：“因告以王瑶之作不能用之，缘其思想性太低之故。”信中的“思想性太低”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出版后遭致批评一事密切相关。《中国新文学史稿（上）》1951年经开明书店出版后，各方意见不断。1952年8月30日《文艺报》特意在出版总署文化宫召开座谈会，编委会成员中就有叶圣陶、李广田受邀出席。虽然与会人员有不少维护王瑶的发言，但《文艺报》的“编者按”定调此次座谈会“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⑥，谨慎的编委会成员自然会对王序产生担忧，害怕因此波及《朱自清文集》，所以决定弃用。因自己“思想性太低”而牵连到老师文集的出版，这应是王瑶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朱自清文集》“序文”改“题记”的小插曲，恰是这部文集曲折命运的写照。“题记”对迁延出版及“全集”改“文集”等事项避重就轻地解释如下：

《朱自清文集》是《朱自清全集》的精简版本。……

编委们复看全稿，重新考虑如下几点：在出版工作逐步走向计划化的今天，“全集”是不是可以精简些？有些不很重要的著作，或者是编辑得不够完整的，为了印“全集”收了进去，是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朱先生的著述是社会所需要的，这不成问题，可是需要有广狭、缓急的分别，是不是单把需要广的、需要急的出版更好些？^⑦

在历经波折近五年时间后，《朱自清文集》终于在1953年3月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四

1950年俞平伯作《庚寅端阳重读佩弦兄遗文》旧体诗一首：

翠地帘波绿间红，横枝花艳玉玲珑。

苔芜三径迷前迹，邻笛黄垆感叹同。^⑧

最后一句的“邻笛”出自向子期《思旧赋·序》：“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⑨，“黄垆”源出《世说新语·伤逝》，王戎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⑩在这两个典故里，向秀、王戎追怀昔为竹林友，今作九泉隔的嵇康、阮籍等人之际，还有因“为时所羁绁”未能维持当初志向的自责之情。俞平伯借用二典，以“感叹同”收束，显然心有戚戚焉。俞诗中的婉曲衷情在其他编委处当有共鸣。对编委们来说，文集终获出版，虽告慰了好友，但删改出版这一事实却成为心中的隐痛。因此在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叶圣陶复浦江清信中直云“此事终觉草率，厚负佩弦”。王瑶多年后有同样解释：“当时，我对《朱自清全集》没有能够出版，感到十分不安。……然而实际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如朱先生的散文《背影》，多年来皆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本，但在一个时期因为据说内容涉及人性论而被删掉了，‘全集’怎么能有条件出版呢！”^⑪换言之，新的社会准则与时代风气对这群人施加了巨大心理压力，与事之人才会进行自动省察，使得此事一再拖延直至最后改弦更张。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求全责备他们的谨小慎微，实际上，也正是他们有底线的坚持，《朱自清文集》才能作为一份友谊和时代的双重见证呈现在我们面前。

相较同样由开明书店负责印行的属于“新文学选集”丛书之一的《朱自清选集》，作为一项建国后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⑫计划的一部分，《朱自清选集》由李广田负责编选，他写序言时还认为“这本选集，是当朱自清先生的全集行将出版的时候选定的”^⑬。但此书出版却早在1951年7月，发行量高达20000册，而《朱自清文集》耗时多年方得出版，且仅印行2500册。孰轻孰重，

不言而喻。出版社方面对文集出版的调整，选集出版的配合，昭示着书店此后的动向。开明年轻一辈掌权后，他们希望完全融入新社会，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倡言“（开明书店）改变的最主要环节，应该放在政治任务上面。……开明书店这整个事业彻底服从政治。这样，只要政治任务能完成，开明事业本身的能否存在，是很小的事”^⑭。正是这种“过分积极”^⑮的态度，导致开明书店在行业内最早申请公私合营，短暂地“合作”了三年之后，更主动于1953年融入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以后者为基础组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俱迟至1953年才申请公私合营，二者却因缘留存，曾与它们分庭抗礼的“开明书店”却已然成为古迹，这不得不说是—种巨大的遗憾。

对即将蓬勃展开的当代文学而言，发行量甚小的《朱自清文集》却是文学出版方式上的一块“界碑”，它标志着现代文学出版传统的终止与当代文学出版体制的发端。在1949年以前，大型出版社多为综合出版社，新文学出版社数目众多，因此，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关系平等，出版行为基于彼此的自由选择，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拥有较多的改动权。编辑虽然是出版社职员，但因为身份的多重性，他们与作者之间往往有着良好沟通。无论作者或编辑，都是文化场域的精英，居于中心地位，对身居外围的读者施以文学“启蒙”。建国后，因为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被视为第一位，国家逐步动用行政、经济、文化的力量对继承下来的出版格局进行全面重组。“文学出版”作为事关历史叙述的“权力”，尤被执政者视为需要予以严格管控的对象。各私营出版社转型为专业出版社，文学出版业务都被消减剥离，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成为计划型出版体制的组成部分。同时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1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作家出版社（1953年）等的建立为代表，新型专业出版社入主文学出版领域，实现了对该业务的绝对控制与垄断。编辑则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纯技术工种，兼具意识形态检查功能。对作家而言，作品的结集出版不仅与时代风向有密切关联，还是本人政治声誉升降的风向标；而由何等级别的出版社、何种类型的出版社接手更是“承认的政

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作家在出版中越来越处于被选择的弱势地位。与之相反，以读者批评为代表的力量日益壮大，开始逆向地对作家、编辑进行文学“再教育”。如上所述的出版社、编辑、作家、读者在出版过程中权力的“沙漏”型生态格局，我们皆可从《朱自清文集》出版这一史实，追溯出嬗变的蛛丝马迹。最终正是此种出版格局的全力配合，“当代文学”才顺畅接替“现代文学”，成为无可挑战的体制存在。

- ①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8卷，第8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相同版本参考文献俱不再另行标注。）
- ②③⑥⑧⑨⑩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1卷，第304—305页，第305页，第310—311页，第314页，第225页，第26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④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22卷，第23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
- ⑤杨天堂：《杨天堂文集》，第4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⑦叶圣陶：《叶圣陶致朱自清夫人陈竹隐信》，《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18日。
- ⑪详情请参拙文《新论1949年叶圣陶“北上”缘由》，《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
- ⑫季镇淮：《朱自清先生传略》，《朱自清文集》第1卷，第19页，开明书店1953年版。
- ⑬王瑶：《古逸歌谣集说·跋》，《古诗歌笺释三种》，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⑭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第249页，第285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 ⑯此目录后来收入《朱自清文集·题记》。
- ⑰因已出版的叶圣陶日记与原文相比，存在大量删减缺省等情况，为准确起见，下文所引日记均为由叶永和先生、蒋燕燕女士二位提供的原文，不再另行标注。
- ⑱⑲《开明书店版税版权登记簿》，第9页，第11页。
- ⑲此后叶圣陶1950年8月12日还记有“平伯允与余合作佩弦全集之序文，彼已完稿，交余补充，余尚未能就”。但此后俞叶二人合写序文不再提及，笔者推测该序被弃用。
- ⑳《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请求与国家合营的复函》，上海市档案馆藏，B1—1—1887—15。

- ㉑《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9月。
- ㉒⑳《生产部工作报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顾均正同志在座谈会上的报告》，《开明通讯》第5期，1950年12月31日。
- ㉓胡愈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综合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日。
- ㉔㉕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24卷，第106页，第210页。
- ㉖参见《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开明书店报告》与《开明通讯》第1期，1950年8月15日。
- ㉗《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11月。
- ㉘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人民日报》，1949年8月19日。
- ㉙黄庆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人民教育》，1951年第7期。
- ㉚方昕、赵铭忠：《对教材〈背影〉的意见》，《新教育》，1951年第7期。
- ㉛编者：《对〈背影〉的意见》，《人民教育》，1951年第10期。
- ㉜《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于〈背影〉的检讨》，《人民教育》，1952年第4期。
- ㉝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26卷，第288页。
- ㉞《〈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 ㉟《朱自清文集·题记》，《朱自清文集》，第7—9页。
- ㊱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1卷，第430页。
- ㊲〔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2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 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 ㊴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文艺报》第49期，1988年12月10日。
- ㊵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范例》，《朱自清选集》，第5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 ㊶李广田：《朱自清选集·序》，《朱自清选集》，第7页。
- ㊷《“开明发展历史及今后任务”学习总结报告——北京同人学习委员会学习第三小组》，《开明通讯》第4期，1950年11月30日。
- ㊸此为笔者2011年11月27日采访开明书店前职员、《中学生》编辑欧阳文彬先生时她的原话。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何吉贤